

财政史研究

(第十辑)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史研究所◎编



- 节用与裕民并重.....叶 青
- 我国古代的预算和审计管理制度探析.....孙翊刚 王文素
- 中国税收的起源：从传说走向信史——蚌埠禹墟发掘的展示.....阮宜胜
- 浅论桑弘羊的财经改革.....洪 钢
- 比较：“结构”还是“类型”——中外财政史比较方法论要.....姚轩鸽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财政史研究

(第十辑)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史研究所 编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财政史研究. 第十辑/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史研究所编.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 - 7 - 5095 - 7886 - 5

I. ①财… II. ①中… III. ①财政史 - 研究 - 中国 IV. ①F8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0632 号

责任编辑: 洪 钢

责任校对: 张 凡

封面设计: 孙俪铭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营销中心电话: 88190406 北京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84041336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14.5 印张 328 000 字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58.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7886 - 5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 010 - 88190744

打击盗版举报热线: 010 - 88190414 QQ: 447268889

《财政史研究》编委会

顾 问：李俊生 孙翊刚 李炜光

编委会主任：马海涛

编委会成员：白彦锋 王文素 马金华 李 佳
张广通 刘 明

主 编：王文素

前 言

中国财政历史，源远流长。我们的祖先在为民族昌盛、国家富强的奋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财政思想和精深的安邦智慧，是我们取之不尽的文明宝藏。

财政虽然属于经济范畴，但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创造的劳动成果日趋丰富，私人占有财产形成一定规模，凌驾于普通百姓群体之上的权力集团随之出现，所需公共事务开支就必然对私人经济部门的产品进行再分配——早期的财政产生了！我国舜禹时期，正是人类历史上如此重要的年代。当黄河、淮河流域的水患基本治理平复，两岸居民有了安居和生产的条件后，大禹划地居民，在组织生产、生活的同时，通过对版图内自然环境的调查研究，制定了居民赋税贡纳制度（见《尚书·禹贡》）。规定每个社会成员必须承担纳赋（土地税）、进贡（山林出产税）的义务，根据地质、地势和产出品种确定不同的税率及贡物，体现了区别对待、公平负担的财政原则。所以司马迁肯定地说：“自虞、夏时，贡赋备矣”（见《史记·夏本纪》）。进入西周时期，相传周公制定了集夏、商以来国家机构设置（包括财政经济管理机构）及其职责、职权的制度大全《周礼》；西汉中，司马迁作《平准书》《货殖列传》专篇，前者为西汉前期的财税制度，后者为秦汉时期的经济地理。自此，各朝代国史均设《食货志》为财经专章，沿袭至清朝。

中国立国数千年，“以史为鉴”始终是各代政治家、思想家治国平天下，史学工作者治史的金科玉律。近代历史学家吕思勉说：“历史果何等学问？治之果有何用耶？自浅者言之，则曰：史也者，前车之鉴也。”“史也者，所以求明乎社会之所以然者也。”“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司马迁所著《史记》，人称“事覈词简，是称实录”。财政史的研究，亦是对财政思想、发展规律和实践经验的记述及科学总结。我们不仅要运用现代财政学理论对人类社会历史上的各种财政现象作定量和定性的分析、研究，从中提炼出财政制度变迁史研究的理论框架，还要进而揭示财政发展的客观规律，对现代财政学理论的研究做出贡献，为未来国家财政政策、制度的设计提供发展趋势的建议。

我们确定的财政史研究范围是中国古代至近现代的财政史实；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财政制度、财政政策、财政思想；研究内容是以中国财政制度和财政思想为核心，并将关系密切的货币金融、会计、审计、贸易等部门经济史融合一体，构成独具特色的中国财政体系；重点研究中国古代与近代社会中居支配地位或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经济、制度等因素对中国财政制度和理财思想的形成、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并从中西方的社会性质、经济制度以及政治、文化、宗教、地理环境的差异中，探寻中国财

政制度、财政思想发展演变的规律及其在世界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与价值。

财政史展示的是一个宏大而久远的课题，为了把对她的研究推向更高的阶段，对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央财经大学各届相关领导和教师对此倾注了大量心血。我校曾经编著并公开出版了第一部《中国财政史》教材，举办了第一届全国财政史助教进修班，成立了中国财政史研究所，并创建了第一个“中国财政史”研究网站，承办了第一届全国财政史专业委员会年会，举办了第一届财政史教学国际研讨会。我们一直在努力奋斗，力争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史学科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特色鲜明的成熟学科，成为实质性的全国财政史教学科研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在向前发展，新的事物不断涌现，财税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迎接新的使命和挑战。为此，在中央财经大学各级领导的支持下创办《财政史研究》刊物，以期为全国广大财政工作者，理论研究者、教授、专家提供一个探究财政历史发展理论和史实的平台。为此，我们希望各位专家、教授和广大读者热心参与、勤奋耕耘、精心呵护、精诚合作，共创财政历史研究的繁荣局面！

目 录

财政与政治经济

- 节用与裕民并重 叶 青 (3)
- 贪污惩治、税政革新与派系权争
——抗战胜利前后直接税署长高秉坊贪污案解析 魏文享 (12)

收入与管理改革

- 我国古代的预算和审计管理制度探析 孙翊刚 王文素 (41)
- 中国税收的起源：从传说走向信史
——蚌埠禹墟发掘的展示 阮宜胜 (50)
- 中国历史上分税制研究 赵云旗 (59)
- 简牍所见秦“内史”及相关问题分析 朱德贵 (84)
- 民国时期个人所得税的历史变迁及评价 齐海鹏 (99)

思想人物与文化

- 浅论桑弘羊的财经改革 洪 钢 (111)
- 岂必加税而后收入始增
——试述民国北京政府盐政改革中的丁恩 李胜良 (131)
- 中西合璧，亦中亦西：孔祥熙理财思想探析 蔡志新 (145)

财政史教学改革

- 浅谈国家治理体系下政府与大学的关系 李佳 鲁艳 (159)

借鉴参考与对比

- 比较：“结构”还是“类型”
——中外财政史比较方法论要 姚轩鸽 (179)
- 中西中古税制差异及对当代国人的启示
——读顾奎斋《中西中古税制比较研究》 曹钦白 (192)
- 制税权·政体·税收制度

-
- 中、英、法三国封建社会财税体制与政体路径分析 马金华 刘 锐 (195)
- 从“领地国家”到“税收国家”
- 中世纪晚期法国君主征税权的确立 熊芳芳 (202)
- 增值税历史沿革及中国与欧盟比较
- 兼论中国与欧盟增值税差异 刘燕明 (214)

财政与政治经济

节用与裕民并重

叶 青

摘要：“节用裕民”一词出自《荀子·富国》。从2005年起，国务院提出建设“节约型政府”。在2017年的全国人代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坚守节用裕民的正道”。最近几年，节用与裕民并重，逐年降低企业负担，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要做到“节用裕民”，最有效的办法是财政学、国学进入各级党校，提高干部的财政素养。

关键词：节用裕民 节约型政府 减税降费

一、节用裕民是正道

2017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①：压缩非重点支出，减少对绩效不高项目的预算安排。各级政府要坚持过紧日子，中央部门要带头，一律按不低于5%的幅度压减一般性支出，决不允许增加“三公”经费，挤出更多资金用于减税降费，坚守节用裕民的正道。

据一位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成员说^②：总理专门在报告中加了一句话“坚守节用裕民的正道”，就是要增收节支，要精打细算过日子，把钱花在刀刃上。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除烦苛之弊，施公平之策，开便利之门”这句话也是总理加上去的，把简政放权、“放管服”真正的含义充分表达出来了。

“节用裕民”一词出自《荀子·富国》：“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意即使国家富足的办法途径是节约用度，使百姓富裕，并且善于储备那些节余的东西。荀子希望用礼法制度节约用度，用政策使百姓富裕。可见，“节用”主要是对政府及官员的要求，“裕

作者简介：叶青，男，1962年生，福建建阳人。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

① 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3月5日。

② 陈凌墨：《总理亲自将“坚守节用裕民的正道”写入报告》，《楚天都市报》2017年3月6日。

民”是政府工作所要达到的目标。又可以说成是“节用减负”。

（一）“节用之道”的由来

2005年7月，国务院颁发了《国务院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重点工作通知》，提出“各级政府部门要从自身做起，带头厉行节约，在推动建设节约型社会中发挥表率作用”。要“推行政府机构节能采购，优先采购节能（节水）产品和节约办公用品，降低费用支出。”

2007年3月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当前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解决一些行政机关存在的严重铺张浪费问题”；要“堵塞管理漏洞，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政府。”

但是，党的十八大以前，建设“节约型政府”的行动的效果并不明显。也就是说，在落实上欠佳。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2014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各级政府必须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坚持过紧日子。要严格执行“约法三章”：政府性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和改扩建，财政供养人员总量只减不增，“三公”经费只减不增。

（二）“裕民之道”^①的举措

在2016年6000多亿元的减税降费政策基础上，2017年国务院公布新一轮5500亿元减税降费新政，全年减税降费总规模有望突破万亿元，从而大力降低企业成本，帮助企业转型升级。

营改增专家、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胡怡建预测，随着营改增政策完善等因素，2017年减税力度将更大，全年减税规模有望达到7000亿元。因最大减税举措营业税改增值税（营改增）已于2016年全面推开，减税空间将逐步减小，但是，减税还是目前的重点。

根据预算草案报告，2017年新减税政策除了简并增值税税率，还有三项聚焦于中小微企业减税新政。一是扩大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微企业范围，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至50万元。二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高到75%。三是继续实施2016年年底到期的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城镇土地使用税等6项税收减免政策。

政府工作报告还披露了详细的五项降费举措，预计全年再减少涉企收费约2000亿元。一是全面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取消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等基金，授权地方政府自主减免部分基金。二是取消或停征中央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35项，收费项目再减少一半以上，保留的项目要尽可能降低收费标准。三是减少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性收费，清理取消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违规收费。四是继续适当降低“五险一金”有关缴费比例。五是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用能、物流等成本，比如，采取降网费、电费、物流

^① 参见陈益刊：“万亿减税降费新政下月起陆续落地 中小微企业将享更多红包”，《第一财经日报》，2017年3月21日。

成本等措施。

二、历史上的“三政”^①

通过研究中国的财政思想史，节用往往是一种主流的思想。其中的“三政”具有代表性。

（一）政在节财

《孔子家语·辩政第十四》记载：“子贡问于孔子曰：昔者齐君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节财。鲁君问政于夫子，子曰：政在谕臣。叶公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悦近而来远。三者之问一也，而夫子应之不同然，政在异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齐君为国，奢乎台榭，淫于苑囿，五官伎乐，不解于时。一旦而赐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节财……察此三者，政之所欲，岂同乎哉？”

子贡问孔子说：从前齐景公请教您如何才能使政治清明，先生说：政治清明在于节省财用。鲁哀公请教您如何使政治清明，您说：政治清明在于教育臣下。楚大夫叶公请教您如何使政治清明，先生说：政治清明在于使近者高兴，远者来归。三个人问的是同一个问题，而您的回答却不同，难道是有不同的解释吗？孔子回答说：因为各人有不同的情况啊。齐景公治理国家，亭台楼阁建筑得太奢侈了。打猎时所圈的土地太大，声色之好，没有一刻停止过。一个早上就赏赐了三个能够提供一千辆战车的采邑，所以我说：处理政务在于节省财用……仔细考察这三个方面的问题，难道政务上所要解决的困难，可以用同一个方法吗？

（二）政在得民

《孟子·尽心上》记载，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孟子说：仁德的言语不如仁德的声望那样深入人心，好的政令不如好的教育那样赢得民众。好的政令，百姓畏服；好的教育，百姓喜爱。好的政令得到百姓的财富，好的教育得到百姓的心。孟子在这里强调，民心比民财更为重要，因此，“得民”可以演绎为“为民”。有一条“儒家定律”很重要，即《大学》中说“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孟子是主张得民财要适可而止，得民心则是多多益善。

（三）政在去私

西晋的傅玄在《傅子》中说：“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主持政务关键在于去掉私心，否则就没有公道可言了。官员不论大小，私利不可图。

（四）取之有度

为政之道，应该节民财、得民心、去私心，对于一个个具体的官员来说，就是节约公物的事多多去做，不取不义之财，官官如此，政府也就是应该能够得民心的政府。

^① 参见叶青：“政在节财，政在得民，政在去私”，《党政研究》，2014年3期。

节用爱民就成为历代为政者推崇的执政理念和伦理准则。“节用”思想源于先秦墨家，墨子所主张的节用，对于个人和社会而言是指朴素简约、不尚奢华、注重实用的生活态度和社会风尚。对个人而言，“耳目聪明则止，不及五味之调”；对于国家而论“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固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①。墨子阐释了为政者须节用的原因，小国寡民、物力有限，只有节用才可以实现财富的积累。

“节用”的主张虽源自墨家，但是为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大家所推崇，并与民本主义的主张合流，成为传统政治的伦理基础。春秋时期政治家思想家管仲指出：“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②。即征敛民力要节制，使用民财要适度，这样即使是小国也可以保持安定；如果对百姓横征暴敛，无节制地浪费民力，即使是大国也会有倾覆的危险。管仲从政权兴衰存亡的高度告诫统治阶层一定要节制物欲、爱惜民力。

从历史上看，凡是取之有度的年代，官民关系就比较和谐，反之，则是激烈的税收冲突。以武汉为例，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梁元帝（550—577）时，武昌称郢州，当时的郢州刺史陆法和发明了一个商民自觉交税的盒子，盒子上有一个入口。陆法和命人将盒子放置到街市上，也就是说，来市场交易的商人根据售卖货物的多少，自觉将税钱投入盒中，税钱多少由自己估计决定。到晚上，官员再开箱清点税钱入库。史载“又列肆之内，不立市丞牧佐之法，无人领受，但以空槛龕在道间，上开一空受钱。贾客店人随货多少，计其估限，自委槛中。行掌之司，夕方开取，条其空目，输之于库”^③。

与古代常见的商人逃税、税官追缴现象形成鲜明对照，那时商民诚信经营，自觉纳税，成为风气。这一点无论在中国古代，还是放在今天，都是十分罕见。商业诚信，武汉人在中国历史上可谓领风气之先。

这种自觉纳税的行为，有诸多好处，一是极大地降低了纳税成本与征税成本。对纳税人来说，只是在回家路过税箱的时候顺便把税给交了，成本极低。对征税人来说，几乎是零成本。做一个箱子要花多少钱呢？因此，在当时的汉口市场上，征税机构与征税官员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二是税收征纳关系和谐了。不可能出现为了征税而争吵的面红耳赤、大动干戈的场景。三是真实的税收带来了商贸发展的真实数据。市场商贸税收的多少，反映了市场商贸业的发展状况。如果把市场每天的税收“大数据”加以分析，就很容易得出市场商贸健康程度的判断。可惜，在中国的赋税史上，这种和谐的关系并不多见。相反，大部分朝代的更迭，都是由于赋税、徭役的过重造成的。

同样在武汉这个地方，也发生了暴力征税的故事。是全国的一个缩影。

南宋时期，鄂州（现在的武昌）已经设置了固定的收取商税的机构——税务亭，当时的税务亭设在南市江边。税务亭掌握着收税大权却没有有效的监督，少数税官便使用手中职权为非作歹，进行欺诈勒索。税务亭因有盘查商人的权力，这些税官就雇佣爪牙，在商船到来

① 《墨子·节用上》。

② 《管子·权修》。

③ 李百药：《北齐书》卷22《列传第二十四》。

之时，上船恫吓商人以便勒索，商人如果争辩，船只和货物便会被扣留。税务亭的勒索行径无法无天，因而，有商人称这类税务亭为“法场”。当时的商人把税务所视为“法场”，可见税政之苛。

明代在汉阳城与鹦鹉洲之间的夹河处设有鱼税征收机构——河泊所。因鹦鹉洲是长江中游著名的竹木市场，故河泊所一带商贸繁荣、人烟稠密，从事打鱼的人也不少。

除了收鱼税，还征收矿税。河泊所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税关。由中央派出专门的税监到地方进行监督。派出去的税监大都是皇帝身边的太监红人，到了地方之后，以皇帝的代言人自居，骄横跋扈，不把地方官放在眼里，而且越俎代庖，控制了各种税的征收权，还勒索鱼肉百姓。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神宗（1563-1620年）派税监陈奉在湖广会馆（武昌）设点征税。陈奉在武昌横征暴敛，抢劫民财，甚至随意殴打湖广官吏。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其爪牙擅闯民宅，奸淫民妇，致民怨沸腾，由此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武昌商民反税监斗争。

武昌商民万余人包围征税衙署，湖广佥事冯应京（1555-1606年）列陈奉十大罪状。消息传至京城，明神宗却下诏，将冯应京解职并押送进京。武昌商民得知消息，再度包围征税衙门，陈奉逃入楚王府，其属下15人被商民抓住后丢入大江，“每投一人，两岸居民皆拊掌大笑为乐”（黄宗羲：《明文海》卷426传40，清涵芬楼抄本，第4207页）。此文可能有出入。武汉江段甚宽，不太可能武昌鼓掌汉口看得见的。

不过，可见武汉商民对税监及其爪牙平时作恶的深恶痛绝。经此一事，明神宗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以及众怒难犯，被迫把陈奉撤回京城。武昌商民反税监，致全国反税监、矿监的斗争风起云涌，影响波及全国。

1889年张之洞督鄂后，采取一系列发展湖北经济的洋务新政，对汉口市场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其中，张之洞主张振兴工业，多出土货。为此，他减免土货税厘，对民族资本工厂实行请免税厘政策。之后，武汉的官办私营工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据统计，至1911年武汉有较大型的官办、民办企业28家，资本总额达1724万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第二位。在商品流通方面，也是尽量减少负担。制定“便商”“利商”的规章，“除免省城护房捐”“裁并百货厘卡，改征统税”“裁厘局十有九，留二十局”等措施打击了敲诈勒索、中饱私囊的厘卡人员，大大减轻了商人的负担。可见，“大武汉”与“大减税”是相对应的。

统税，是旧中国征收的一种货物税，也是“厘金”的一种，统税首见于1904年。中国清朝政府连年战争，国库空虚。为了充裕国库特地新增的新型货物税，谓之统税，该赋税为课征于特定货品的货物商品税，因税收方式视商品类型统一税率征收而得名。清朝结束后，中国长期内战将近15年，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各地统治者税收方式不一，统税制度并无全面施行。

仅从武汉一市来看，就经历了从“盒子征税”“视如法场”“暴力反抗”到“裁并百货厘卡”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说明了中国的历史上，武汉这座城市，既有很和谐的税收关系，也有很激烈的税收冲突。税收与经济发展，有一种鱼与水的关系。

三、节俭养德财政为先

长期以来,在安排我国各级财政支出中,必须坚持三条原则:量入为出、收支结合原则;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原则;厉行节约、讲求效益原则。但是,说到不一定就会做到。目前属于既要说到又要做到的阶段。

2014年5月27日,中宣部、国家发改委发出开展节俭养德全民节约行动的通知,要求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根本目标,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深入进行节俭节约宣传教育,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节俭节约实践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厉行节约、拒绝浪费的浓厚氛围。节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开展节俭养德全民节约行动,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凝聚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强大力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加强正面宣传,弘扬中华民族戒奢克俭优良传统,大力宣传节俭节约的先进典型,积极倡导节约光荣社会风尚,推动人们养成健康文明生活方式。要抓好监督,曝光铺张浪费的典型案例,形成破除讲排场、比阔气等不良风气的强大舆论压力,强化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导向。

注重结合融入,广泛开展节约主题的群众性教育实践活动。党员干部、党政机关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在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中开展“俭以养德向我看齐”教育实践活动,引导党员干部在崇尚节俭、反对浪费上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在社区和家庭开展“俭以养德 人人行动”教育实践活动,号召全社会从每一个人做起、从每个家庭做起,让节俭节约蔚然成风。动员各行各业开展“俭以养德见于管理”教育实践活动,把节俭节约理念做到管理中、融入实际工作中、贯穿于社会治理中。

把节俭节约意识融入学校教育。开展青少年节俭养德主题教育,加大节约资源教育与宣传力度,让青少年在浓郁的氛围中受到熏陶、得到感染,从小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在大中小学开展“文明餐桌”等主题实践活动,建设节俭节约实践基地,组织开展节粮、节水、节电体验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节俭养德全民节约行动摆在重要位置,精心组织、密切配合、各展所长,形成规模、形成声势。要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和主动精神,把群众发动起来,让群众参与进来,使群众成为全民节约行动的主角。要不断创新形式和载体,增强群众性、广泛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消费而不浪费,勤俭节约,这符合中国的传统财政思想。

四、增强干部的财政素养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其中,第三条是“坚持尚俭戒奢,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2月11日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为广大党员干部加强党性学习、提高党性修

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意味着党员、领导干部要从内心认识到勤俭节约的重要性。为了增强党员干部的财政素养,建议财政学课程与国学课程进党校。

构建一个节约型政府,应当恪守的道德伦理准则是:节制物欲,俭以养德;公私分明,慎于用权。“天育万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制不生期间,则物暴殄而财乏用”^①。自然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其物质和能量转换是恒定的、有限的,它可以供给人类合理的需求,但不能满足人类无限膨胀的私欲;如果一个社会物欲无限膨胀,又没有公平合理的制度加以调节,那么其结果将一方面是大量浪费资源。另一方面则物乏财尽民生凋敝。俭以养德、勤俭持家、勤俭建国是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都坚持了勤俭建国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强调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党和政府应该始终保持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勤俭节约不仅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加速经济积累;更是为了政治上保持党和群众之间的联系,整肃党风党纪,保持党的纯粹性和革命性。

当今的中国贪官都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特点:不珍惜国家的钱财,而孔子早就说过:“政在节财”,即行政的关键是节约公共财富。

——2014年11月6日至15日,河南省委原常委、洛阳市委原书记陈雪枫在参加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第7期省部级干部党性教育专题培训班期间,违反中组部关于“不准秘书等工作人员陪读”规定,安排秘书丁某、市委副秘书长董某等人陪读,产生的交通、食宿、差旅等费用共2.6万余元,公款报销。

——2014年1月至2015年7月,吉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原副省长谷春立,在已分得副省级干部周转房的情况下,长期占用长春市乐福大酒店1间客房,房费共计34.38万元。

——2014年8月以来,浙江省宁波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子跃,多次安排公务用车接送浙江省金华市的理发师,往返500公里,到宁波市专门为其理发。

2013年,凤凰网、腾讯网等多家媒体披露,中国“三公”消费已经突破9000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0%。据测算,2013年公车消费的支出是2000亿。关于公车数量,以2011年北京市政府公开的资料来看,当时北京市党政机关和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保有的公车是62026辆(不包括军队、国有企业和超编配置的公车),相比之下德国柏林仅有公车92辆,其中个人专车37辆,一般办公用车15辆,送文件车23辆。在森林覆盖率超过75%的芬兰,全国保有的公车仅4辆,包括部长在内的政府高官骑自行车上班已经蔚然成风。

公车改革到底能不能起到节约的作用?我们可以以江西省新余市为例加以说明。

从2014年1月1日起,江西省新余市市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正式实施。根据车改方案,涉改的700多辆车中的5/6将面向社会公开拍卖处理,拍卖款项全部上缴国库。剩下的130多辆车由新组建的市公务用车服务中心集中管理,便于车改后远程公务用车和市内重大活动、抢险救灾、执法执勤用车等。

根据车改方案,对参加车改的县级(含县级)以下人员分9档发放个人公务交通补贴,发放标准为每人每月300—2500元不等^②。单位公共交通过费,按照该单位个人公务交通补贴标准总和的10%—15%划拨。

^① 《白居易全集》卷63。

^② 2014年7月全国统一车改以后,最高一档降到1690元。